

格致经管前沿



刘晴 著

二元经济结构、国际经贸 新规则与外贸转型升级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致经管前沿

刘晴 著

二元经济结构、国际经贸 新规则与外贸转型升级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元经济结构、国际经贸新规则与外贸转型升级/

刘晴著.—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9

(格致经管前沿)

ISBN 978 - 7 - 5432 - 2879 - 5

I. ①二… II. ①刘… III. ①二元经济-研究-中国
②对外贸易-研究-中国 IV. ①F121②F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6302 号

责任编辑 张宇溪

装帧设计 路 静

格致经管前沿

二元经济结构、国际经贸新规则与外贸转型升级

刘晴 著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 民 出 版 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25

插 页 2

字 数 214,000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32 - 2879 - 5/F · 1116

定 价 55.00 元



目 录

第1章 绪论	001
1.1 问题的提出	001
1.2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	006
第2章 文献综述	013
2.1 二元经济结构文献	013
2.2 国际经贸新规则相关文献	018
2.3 贸易转型升级文献	026
2.4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029
第3章 二元经济结构与外贸转型升级的理论分析	031
3.1 引言	031
3.2 基准模型	035
3.3 模型稳健性:引入纯内销企业	048
3.4 扩展模型:放松同质劳动力假定	053
3.5 本章小结	056
3.A 第3章附录	057
第4章 二元经济结构与外贸转型的实证分析	065
4.1 引言	065
4.2 机制分析	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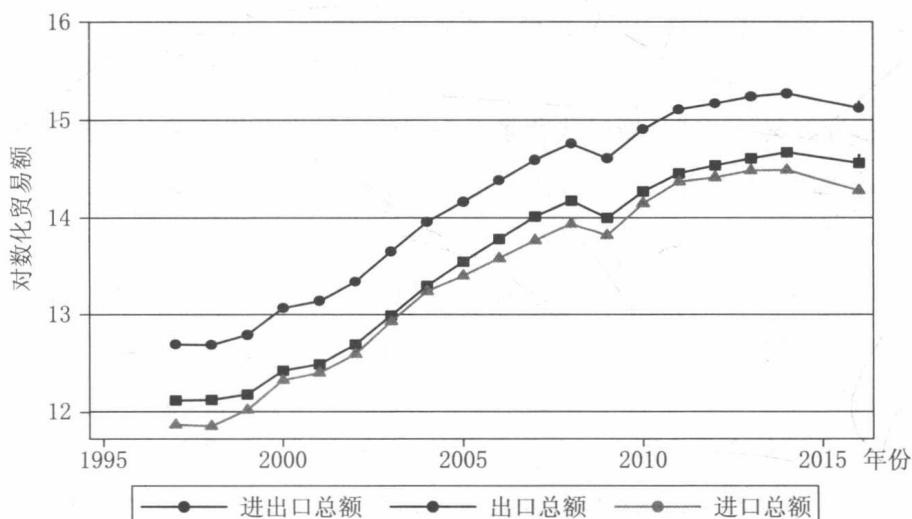
4.3 实证分析	073
4.4 本章小结	085
第5章 国际经贸新规则与外贸转型升级的理论分析	088
5.1 引言	088
5.2 国际经贸新规则主要内容及典型特征	092
5.3 我国对外贸易的微观典型事实	099
5.4 国际经贸新规则对中国企业贸易边际的影响	103
5.5 国际经贸新规则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	111
5.6 本章小结	117
第6章 国际经贸新规则与外贸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	120
6.1 引言	120
6.2 数据与估计模型	123
6.3 实证结果	130
6.4 本章小结	156
第7章 融资约束、二元贸易与转型升级	159
7.1 引言	159
7.2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理论模型	162
7.3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经验证据	170
7.4 本章小结	188
7.A 第7章附录	189
第8章 结语	195
8.1 结论	195
8.2 政策含义	197
8.3 展望	198
参考文献	200
后记	220

第1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积极实施开放型发展战略,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贸易成本,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图 1.1 反映了中国近 20 年来进出口贸易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海关信息网 <http://www.haiguan.info/>。

图 1.1 中国 1996—2016 年进出口贸易额趋势

从图 1.1 看出,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 1996 年的 2 898 亿美元上升至 2015 年的 39 530 亿美元,已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但是,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高质量的增长,贸易大国也并不意味着是贸易强国。现阶段中国出口导向型贸易主要以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企业较低的生产率且占据中国贸易一半以上的份额(范子英和田彬彬,2014),是构成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的主要原因(李春顶,2010; Dai et al., 2016; Yu 和 Tian, 2012)。同时,出口导向型贸易模式大多处于低附加值、低技术和低资源的行业。长此以往,不仅会造成中国企业在出口市场上倾向于选择“低价格、微利润”的价格竞争模式,还会导致中国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中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的粗放式数量增长模式已难以维系,高质量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外贸转型升级面临的重要内部约束。姚洋和余森杰(2009)指出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是由人口特征和低城镇化水平决定的。虽然加工贸易是一种低效率的贸易,但是加工贸易企业可以吸收二元经济中大量剩余低技能劳动力增进社会福利水平(刘晴和徐蕾,2013)。剩余劳动力在被企业吸收后又会促进城镇化的发展。1978—2014 年间,中国城镇化率从 17.9% 提升到 54.77%。然而,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弱化,劳动力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传统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模式发展需要转型。

国际经贸新规则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外贸转型升级面临的重要外部约束。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 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 RCEP)和服务贸易协定(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简称 TISA)等一系列高标准自由贸易投资协定的达成,促使国际贸易新规则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些协定对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动标准有着严苛的规定,这可能会使中国出口企业面临更高的贸易成本和更大的转型压力。

那么,二元经济结构和国际经贸新规则究竟如何决定对外贸易模式? 又如何影响企业外贸转型升级? 其中的理论机制是什么? 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政府又该制定何种政策?

1.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1) 进一步扩展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需要。

以 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影响深远。凭借简洁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和稳健的结论,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在多个方面得到拓展与应用(Redding, 2011; Bernard et al., 2012; Grossman and Helpman, 2015)。然而,无论是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还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多是以发达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出口事实为研究出发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事实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经验事实(Yu, 2015; Dai et al., 2016; Sever, 2016; Defever and Riano, 2017)。中国作为典型的以“二元经济结构”为特征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存在城镇化滞后以及区域贸易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因此,在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的问题上不能与发达国家一概而论。相关经验研究就发现中国企业分布呈现出独特的“双峰”特征(Ludan, 2010; Dai et al., 2016),即高强度的出口企业和纯内销企业占据较大比例,而同时进行大规模内外销售的企业较少,这与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和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预测不一致。同时,国际经贸新规则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不同,因此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考察“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和国际经贸新规则对中国外贸企业贸易边际的影响机制,进而简明剖析其对整个社会平均生产率和社会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 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家贸易理论的需要。

在过去的 40 年中,发展中国家之间发生的贸易(“南—南”贸易)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贸易,“南—北”贸易的发展也保持稳定(Raihan, 2014),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贡献十分突出(Shafaeddin, 2010)。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原因,现有文献专注于贸易政策有效性和政府干预适用性(Athukorala, 2011)。只有 Greenaway 和 Milner(1990)等少量文献,基于传统贸易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了“南—南”贸易的发生原因。

本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贸易转移效应。“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其中很多国家也具有二元经济结

构特征,因而研究“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贸易模式和福利效应对发展南南贸易和维持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2. 现实意义

(1)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进“一带一路”的需要。

十九大报告强调,“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二元经济结构等原因引致的加工贸易出口模式造成了现有经济中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低端供给存在一定的重复和过剩,国内外市场分割明显,且由于现有体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潜在供给未能释放。“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又会对中国出口企业的贸易方式、贸易地理方向和贸易利得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探讨二元经济结构对中国出口贸易模式的影响,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的改变,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进“一带一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积极适应和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的需要。

当前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处于进展加快和竞争激烈的重塑时期。新规则包括了更高水平的低关税政策,更严格的原产地、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新规则条款,这无疑会对中国出口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因而,深入分析国际经贸新规则对中国企业出口贸易带来的影响,对避免中国在贸易规则重塑中被边缘化和推动自贸区建设有重大意义。

(3) 推动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需要。

加工贸易主导的贸易模式使得出口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不适应国际经贸新规则,过于依赖外部需求,进而导致中国贸易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近期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部分原因,正是由于两国分别处在价值链的不同位置,引致了两国不同的贸易模式和差额。因此,熟悉国际经贸新规则,理解二元经济结构对外贸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对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有重大意义。

1.1.3 核心概念的界定

1. 二元经济

“二元经济”(Dual Economy)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 1954)

提出,用来说明工农城乡之间的对立及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分化。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存在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两种性质不同的部门,二者的具体特征见表 1.1。

表 1.1 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化的工业部门比较

部门特征	传统农业部门	现代工业部门
组织方式	自给自足	社会化分工
资源状况	土地、劳动	资本、劳动
技术状况	落后、本地技术	先进、进口技术
规模状况	小规模运作	大规模操作
生产方式	手工劳动	机器大生产
生产效果	规模报酬递减	规模报酬递增

资料来源:高帆(2004)。

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以资本生产为主的现代工业部门同以劳动力生产为主的农业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中国具有典型的传统二元经济结构。除此之外,本书第 3 章还引用了中国贸易“二元经济结构”的概念。Cosar 和 Fajgelbaum(2016)通过将国家视为一个面而非一个点,进而将一国国内地理引入经典的李嘉图模型,并由此推出一个有趣的二元结构,即对外贸易会被限制在一国的沿海地区,而国内贸易则会集中分布在一国的内陆地区。

本书中另一个与“二元经济”相关的概念是“二元贸易”。“二元贸易”是指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并存的贸易模式。导致“二元贸易”结构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加工贸易享受保税监管政策以及一系列税收优惠和信贷便利等鼓励政策;二是中国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鼓励政策和充裕的劳动力大大促进了加工贸易的发展。本书将研究如何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进而弱化“二元贸易”结构。

2. 国际贸易新规则

本书从两个视角分析国际经贸新规则。一是从发达国家视角,分析零关税、贸易便利化、原产地、劳动、环境、知识产权和“竞争中立”等一系列高水平、高标准、高质量的规则带来的影响。这些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 TPP、美韩 FTA、TTIP、RCEP 等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所制定的。二是从发

展中国家视角,分析中国为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贸易模式和转型升级的影响。

3. 外贸转型升级

外贸转型升级的内涵非常丰富。本书所指出的外贸转型升级主要包括两种。第一,从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等四个方面衡量企业的转型升级。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多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且出口产品质量低,企业需要雇用大量劳动力而且只能赚取微薄利润。本书将分析国际经贸新规则如何影响企业在技术、产品和功能等方面的转型升级。第二,通过出口密集度和对外贸易方式的选择来衡量企业外贸转型升级的效果。中国出口密集度高的企业往往享受到政府的出口优惠政策,这可能引致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平均生产率较低。本书将分析出口导向型企业行为逻辑,并提出合理政策建议,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1.2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

1.2.1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1. 研究思路

本书将沿着“文献综述—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建议”的研究思路逐步展开。首先对二元经济结构与外贸转型升级、国际贸易规则与外贸转型升级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及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其次笔者通过建立一个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和出口贸易事实为依据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从贸易成本的角度剖析企业区位分布和贸易模式选择共同形成“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机制。接着,笔者将利用匹配后的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结合相关的计量方法,对二元经济结构下城镇化对企业贸易模式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然后从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和价值链升级的视角,着重分析零关税、贸易便利化、原产地、环境、和“竞争中立”等新规则条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贸易边际和转型升级的影响。随后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及双边贸易数据,分别分析 TPP 和“一带一路”倡议这两个国际经贸新规则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作用效果。为了体现中国独特的二元贸易背

景及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本书进一步通过拓展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内生化出口企业在面临融资约束的环境中对贸易模式的选择行为。最后,陈述本文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主要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总之,第3章和第4章主要基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视角,分析外贸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第5章和第6章则专注于分析国际经贸新规则对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第7章考察了二元贸易背景下融资约束对外贸转型升级的影响。第8章总结全书的主要观点。

2. 研究方法

(1) 异质性企业模型研究法。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由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衍生而来,其分析框架基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强调企业在边际生产成本和固定成本等方面的差异,与现实较为贴近。与寡头垄断模型相比,异质性企业模型在进行一般均衡分析时更简洁,而且基于该模型得出的结论具有更好的针对性和稳健性。在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中,企业的异质性体现为企业支付行业进入固定成本后,从独立的分布中随机抽取边际生产率。在知晓自身的生产率后,企业将决定是否进入以及采用何种方式进入市场。企业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不同的市场需要支付不同的固定和可变贸易成本。在消费者具有不变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假设下,企业将采用固定加成作价,通过比较各种决策带来的利润以确定其最优的市场配置方式。由于模型一般假定企业进入国外市场要支付额外的贸易成本,只有高效率的企业才能进入国外市场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贸易自由化将通过要素市场的出口竞争效应淘汰低效率企业,优化行业内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本书第3章以 Melitz(2003)为基准分析框架,引入国内贸易成本,并考虑异质性企业同时进行贸易模式和生产区位的二维选择,阐明了国内贸易成本如何引致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分析了国内贸易成本的下降如何影响异质性企业的企业行为。第5章基于四个代表性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分析了国际经贸新规则对中国企业贸易边际的影响机制及其福利效应。

(2) 计量经济学研究法。

本书第3章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最小二乘虚拟变量(LSDV)、Logit

回归、Probit 回归这几种现代计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定量分析二元经济、城镇化水平对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传统的 OLS 回归将作为基准检验。Logit 模型是离散选择法模型之一,是一种简单且使用频率较高的概率选择模型。第 3 章解释变量主要为二元选择变量,由于线性概率模型不能保证估计的概率预测值落入 0—1 之间,导致估计的结果是有偏的,而 Logit 模型假设响应变量服从标准 logistic 分布,克服了线性概率模型的弊端,将概率预测值控制在 0—1 之间,提高了回归结果的可信度。另外,采用正态累积分布函数的 Probit 模型也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本书第 6 章将普通最小二乘法、LSDV、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Poisson Pseudo-Maximum-Likelihood, PPML)以及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结合在一起对国际贸易新规则与外贸转型升级进行实证分型。在计量方法的选择方面,Silva 和 Tenreyro(2006)观察到大多数引力方程采用对数线性化的方法,但由于有 $E(\ln y)$ 或 $\ln E(y)$,即 Jensen 不等式的存在,这种计量方法会造成误差。这是由于原始误差在指数方程形式中与自变量独立,一旦转化为对数线性,新的误差则通常与自变量相关,只有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才独立于自变量,因此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可能得出有偏的结果。Silva 和 Tenreyro 建议直接对相乘形式进行估计,即采用 PPML 作为 OLS 估计量的替代。

(3) 调查研究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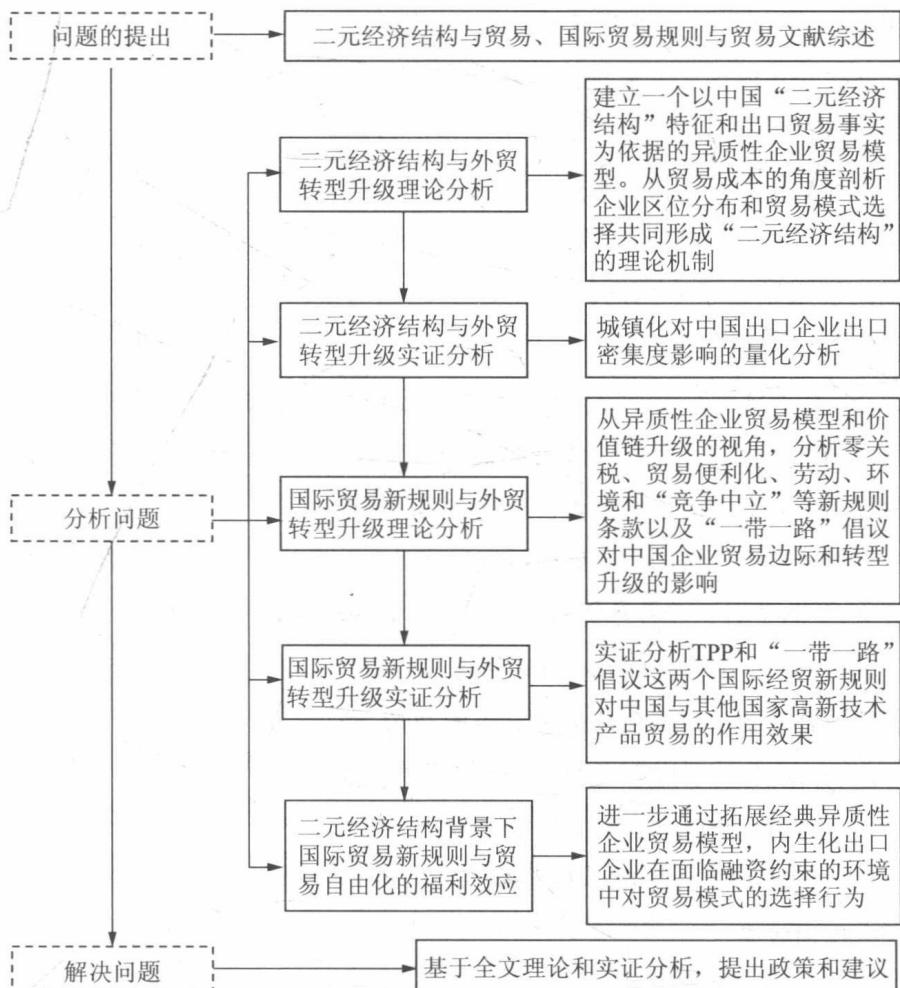
本书通过系统的回顾相关文献,把握国内外关于二元经济与外贸转型升级、国际经贸新规则与外贸转型升级的研究成果和最新动态,总结评述现有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为后续研究提供研究思路和观点。

(4) 比较研究法。

本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比较分析:第一,国家之间的差异对企业决策产生影响。对比分析发达国家和中国企业的出口贸易方式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机制;第二,分别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定的国际经贸新规则对企业决策的影响;第三,中国不同区域间的差异对企业决策产生影响。本书第 3 章和第 4 章都比较了中国不同区域之间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结果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3. 研究技术路线图

具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技术路线图,如图 1.2 所示: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本书内容整理。

图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1.2.2 创新与局限

1. 可能的创新之处

(1) 建立一个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和出口贸易事实为依据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从贸易成本的角度剖析企业区位分布和贸易模式选择共同形成“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机制。

笔者首先在第3章中,建立了一个内生区位选择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并发现国内贸易成本会引致企业将贸易活动集中在沿海地区。与沿海地

区相比,内陆地区企业进行贸易需额外支付一笔高昂的国内运输成本,因此内陆地区企业倾向于发展国内市场,沿海地区企业倾向于发展海外市场。随后,笔者将“二元经济结构”与“高密集度出口模式”引入异质性企业模型,阐明了政府或银行的优惠政策使发展中国家的低效率企业可以通过贸易成本共享的方式参与全球分工,并在第4章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这个观点。第3章理论模型结合了中国的特征事实,其结论对中国出口贸易有着较好的解释力。

(2) 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分析国际经贸新规则对企业贸易边际的影响以及随之产生的企业间资源再配置等微观效应,并基于价值链升级理论分析国际经贸新规则对中国企业价值链布局的影响。

现有文献主要从国家层面或行业层面分析国际经贸新规则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忽略了对企业各种贸易边际和转型升级行为产生的直接影响,进而忽视了其可能产生的企业间和企业内资源再配置等福利效应。本书第5章分别从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和价值链升级的视角,着重分析零关税、贸易便利化、原产地、劳动、环境、知识产权和“竞争中立”等新规则条款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贸易边际和转型升级的影响。

(3) 分别分析 TPP 和“一带一路”倡议这两种国际经贸新规则对国际贸易模式的作用效果。

在国际经贸新规则重塑的背景下,一方面是适宜发达国家合作的“投资与原产地规则”等高标准的规则,另一方面是促进发展中国家贸易的新规则,如“一带一路”倡议。本书在第6章分析了这两种新规则对异质性企业转型升级的不同影响。

2. 局限性

第一,本书所讨论模型基于 CES 效用函数进行分析,因而无法探讨企业成本加成的变化,将会忽视进口竞争效应引致的福利变化。而且由于模型是静态均衡,外部冲击时模型难以分析均衡路径的变动过程,企业无法及时有效地制定政策,规避冲击,稳定出口。第二,囿于数据的可得性,本书使用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只到 2007 年。数据的不可得使本书无法描述企业层面最新的贸易动态事实。

1.2.3 研究结构和内容安排

根据研究思路,后文共分为七章。第2章包括二元经济与外贸转型升级、国际贸易规则与外贸转型升级两部分的文献综述。第一部分的文献梳理表明:第一,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是否迈入刘易斯拐点还没有统一定论;第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符合 Melitz(2003)模型的预测,主要表现为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反而较低;第三,现有文献多是从城市化、集聚和就业等二元经济结构的子课题下开展的企业贸易研究,而缺乏对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企业贸易的研究。第二部分的文献梳理则发现,现有国际经贸新规则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从零关税和贸易便利化角度分析,而忽略了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新规则这些边界内措施的影响,并且多数文献没有考虑到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同时少有文献采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分析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影响。

第3章是对二元经济与外贸转型升级的理论分析。该章通过建立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和出口贸易事实为依据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分析了国内贸易成本对企业区位以及贸易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理论分析,该章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国内贸易成本是贸易集中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主要原因。内陆地区企业参与贸易需比沿海地区企业额外支付一笔国内贸易成本,因而内陆地区企业倾向于发展国内市场,沿海地区企业则倾向于发展海外市场。此外在扩展模型中,将“二元经济结构”与“高密集度出口模式”引入异质性企业模型,阐明了政策扶持的补贴才是低效率企业得以存续并参与贸易的原因。该章理论模型的结论与现有中国出口企业的特征事实基本保持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提供了解释。

第4章是二元经济结构与外贸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该章通过合并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化水平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城镇化水平与企业出口密集度选择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企业转型升级有抑制作用,其内在原因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是农村剩余低技能劳动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只是人口的城镇化,而后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为低效率企业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企业在吸收劳动力后选择从事高密集度模式

的概率增加,从而抑制了企业在外贸的转型升级,而且该章发现异质性企业在不同城镇化水平的地区有不同的选择。实证分析结果也符合第3章理论分析的结论。结论表明减小对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扶持力度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第5章是国际贸易新规则与外贸转型升级的理论分析。主要结论包括以下两点:第一,零关税、贸易便利化和“竞争中立”原则会改善中国企业贸易边际,并通过企业间与企业内资源再配置效应、技术与质量升级效应和结构调整效应增进社会福利。虽然高标准的原产地、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新规则会通过改变中国企业贸易边际而恶化行业内资源配置,但能通过倒逼企业进行全球价值链动态升级和吸收更多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而优化行业间资源配置。第二,国际经贸新规则会促使中国对外贸易企业实现技术升级、产品升级以及跨行业升级。

第6章是国际贸易新规则与外贸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本章通过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TPP及“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外贸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TPP对中国的外贸转型升级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一带一路”倡议会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产生静态和动态的贸易创造与转移效应,并在总体上对中国外贸转型升级产生正面影响。因此,优化高科技技术设施设备,提高高新技术产品质量,促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贸易等方面的合作是促进外贸转型升级的关键。

第7章专注于分析二元贸易背景下融资约束与外贸转型升级的关系。该章通过拓展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内生化出口企业在面临融资约束的环境中对贸易模式的选择行为,并发现一个有趣的结论:融资约束不但不会抑制中国的出口贸易总量,而且可以引致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其中的经济学逻辑是:在中国独特的二元贸易背景下,面临银行融资约束的异质性企业将以更大的概率选择出口导向型贸易模式而非利润率较高的通常贸易。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于加工贸易和高出口密度企业的贸易成本较低,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中的自我选择效应会驱使低效率的企业选择这些贸易模式。因此,银行融资约束和自我选择效应的共同作用会阻碍出口行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利润水平的提高,抑制对外贸易转型升级。

第1章是对全书的总结,包括结论与政策建议。